

康熙朝编设佐领述论

孙 静

(大连民族学院 东北少数民族研究院, 辽宁 大连 116600)

〔摘 要〕 康熙朝大规模编设佐领是八旗基层组织建制完善的重要举措。佐领的编设是在“满洲根本”政策指导下进行的, 八旗兵丁的增加对于确保清朝统治的稳固具有重要意义。然而, 满洲统治者对八旗兵丁束缚的日益强化却严重侵蚀着旗人的活力, 盛世清朝的颓败之势遂难以避免。

〔关键词〕 清代; 八旗制度; 满洲根本

〔中图分类号〕 K24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 (2008) 06-0071-07

八旗制度是清朝社会的一项根本制度。1615年, 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人的战争中创建了八旗制度。《满洲实录》卷四记, 八旗定制时, 每三百人立一牛录, 五牛录立一甲喇, 五甲喇立一固山。牛录汉语称佐领, 它是八旗的基本单位。固山即旗, 是为八旗编制的最高单位, 从后金兴起初创直到清末八旗制瓦解, “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八旗, 每旗析三部, 即满洲、蒙古、汉军”^[1]的组织形式始终未有变易, 但其基层组织佐领的编制与人员定数却随时代发展而有较大调整。

孟森先生的《八旗制度考实》一文对上三旗与下五旗及汉军佐领的编设做了细部考述。另外, 陈佳华、傅克东的《清代前期的佐领》、《清初满洲牛录的特征》与《佐领述略》, 滕绍箴《努尔哈赤时期牛录考》、赵凯《清代旗鼓佐领考辨》等文也从不同角度对佐领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 并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观点。^[2]康熙时期是清入关后旗分佐领大量增置的重要时期, 迄今, 学界对这一时期佐领大量编设的状况尚未给予足够的关注, 而旗分志对佐领的设置与变化则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本文主要利用旗分志及其他相关资

料, 试对康熙年间八旗佐领编设的基本情况做一描述, 并对佐领编设的背景、特点与影响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康熙朝编设佐领始于康熙元年(1662年), 终于六十一年(1723年)。其中, 满洲佐领的编设与康熙的统治相始终。康熙元年, 编设正白旗满洲佐领一, 此后陆续增编新的满洲佐领。康熙六十一年, 增编镶黄旗满洲佐领二, 正黄旗满洲佐领一。随着康熙时代的结束, 康熙朝增编满洲佐领的活动遂告一段落。从时间上看, 满洲佐领的编设集中于康熙元年到二十六年以及康熙三十三年到四十年这两个时间段。康熙朝共增编满洲佐领356个, 康熙十一年, 编设满洲佐领26个; 康熙十三年, 增设35个; 康熙二十三年, 编设满洲佐领132个; 康熙三十四年, 增编满洲佐领42个, 这是编设满洲佐领最多的四个年份。其中, 康熙二十三年新编设的满洲佐领占整个康熙朝编设满洲佐领总数的三分之一还多, 这是满洲佐领编立最多的一年。

康熙朝蒙古佐领的增设从康熙二年开始, 断

〔收稿日期〕 2008-01-28

〔作者简介〕 孙静(1970—), 女, 宁夏平罗人, 大连民族学院东北少数民族研究院副教授, 史学博士。

〔基金项目〕 2008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批准号: 08BMZ009)

2007年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L07BMZ003)阶段性成果。

断续续地到三十四年完成。此间有十九个年份共编设 76 个佐领。康熙二十三年，编设蒙古旗分佐领 25 个，正红旗蒙古一半分佐领发展为整佐领，这一年蒙古佐领增数最多。

康熙时期，汉军佐领的增编始于七年，终于五十一年。在这四十多年中，有十七个年份共编设汉军佐领 55 个。其中，康熙二十二年编设汉军佐领最多，计有镶黄旗汉军佐领 8 个，正黄旗汉军佐领 2 个，正白旗汉军佐领 5 个，正红旗汉军佐领 3 个，镶红旗、镶蓝旗汉军佐领各 1 个，共编设 20 个新佐领，另有 3 个半分佐领增编为整佐领。

总的来看，康熙朝增编佐领持续六十年，时间跨度非常大。但是，具体到满洲、蒙古、汉军，情况却有所不同，满洲佐领的编设最早开始，其次是蒙古，汉军则最晚，迟至康熙七年才有一镶红旗汉军佐领得以编立。另外，从持续的

时间看，满洲佐领编设的年份远远超出蒙古与汉军。尽管如此，康熙二十二年、二十三年分别又是汉军、满洲与蒙古佐领增编最多的年份，大规模编设佐领具有明显的同期性。

清朝入关前夕，八旗计有 583 个整佐领和 28 个半分佐领。入关后，历经四朝，到嘉庆统治时期，八旗合计有整佐领 1145 个，半分佐领 6 个，整佐领比入关前增加 562 个，增幅近一倍。而从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佐领的增数看，顺治年间整佐领增加 70 个，半分佐领减少 7 个；康熙年间，整佐领增加 487 个，半分佐领减少 18 个；雍正、乾隆两朝，八旗佐领增减变化甚微，特别是乾隆朝整佐领的增减数互相抵消，半分佐领还减少了 3 个。康熙朝增编旗分佐领 487 个，约占入关后佐领编设总数的 87%。毫无疑问，康熙朝大规模增编佐领极大地促进了八旗基层组织佐领建制的发展与完善。(参见附表)。

附表：清历朝八旗佐领编数变化表

八旗	入关前 佐领数	顺治朝 佐领增减数	康熙朝 佐领增减数	雍正朝 佐领增减数	乾隆朝 佐领增减数	嘉庆时期 佐领定数
八旗满洲	309 个整佐领， 18 个半分佐领	增 8 个整佐领	增 356 个整佐领， 减 12 个半分佐领	增 5 个佐领	增 2 个整佐领，减 1 个半分佐领	676 个整佐领，5 个半分佐领
八旗蒙古	117 个整佐领， 5 个半分佐领	增 13 个整佐领， 减 5 个半分佐领	增 76 个整佐领， 减 4 个半分佐领	增 1 个佐领	无增减	204 个整佐领
八旗汉军	157 个整佐领， 5 个半分佐领	增 49 个整佐领， 减 2 个半分佐领	增 55 个整佐领， 减 2 个半分佐领	增 4 个佐领，减 3 个半分佐领	减 2 个整佐领，减 2 个半分佐领	265 个整佐领，1 个半分佐领
合计	583 个整佐领， 28 个半分佐领	增 70 个整佐领， 减 7 个半分佐领	增 487 个整佐领， 减 18 个半分佐领	增 10 个佐领，减 3 个半分佐领	减 3 个半分佐领	1145 个整佐领，6 个半分佐领

(数据来源：《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八三七·八旗都统)

二

根据八旗兵丁来源的不同，康熙朝编设佐领主要采取四种形式：滋生人丁分立而成；在半个牛录的基础上发展为整佐领；将新满洲改编为满洲八旗的旗分佐领；将包衣拨入旗分佐领。

旗内滋生人丁编立一新佐领在康熙朝最为普遍。具体而言，它又可分为两种情形。

其一是由一个佐领的滋生人丁、余丁分立而成。如，正黄旗满洲第一参领第七佐领，系第六佐领内滋生人丁，康熙二十三年一等公颇尔喷管

佐领时，分编一佐领，以其弟之子员外郎马哈达管理。^[3]同一参领中第十七佐领，系第十六佐领内滋生人丁，康熙八年费雅思哈管佐领时分编一佐领，以其兄济时哈之孙胡什布管理。^{[4](P.62)}

其二是由多个佐领内的滋生人丁合编而成。也有两个佐领的余丁合编一新佐领的，正黄旗满洲第一参领第十佐领，系第八、第九两佐领内滋生人丁，康熙二十三年陈泰、商世泰管佐领时分编一佐领，令雅賚之孙八十管理。^{[4](P.61)}该参领第十五佐领亦是康熙二十三年由第十三、第十四两佐领内滋生人丁分出而成。^{[4](P.62)}

另外，三个甚至更多佐领余丁合编为一整佐领的情况也大量存在。镶白旗满洲第三参领第十六佐领就是康熙十三年由书舒、阿哈土、西希三佐领的滋生人丁合编而成的。^[5]正黄旗满洲第二参领第八佐领在康熙三十四年由福善、郑安、海寿、齐阑布、基当阿、敦拜六佐领的滋生人丁编立而成。^[6]而正白旗满洲第三参领第一佐领的兵丁成分则更复杂，它是康熙三十四年由十个佐领的余丁组编而成的。^[10]

半个佐领发展为整佐领也是康熙朝佐领编设的重要形式。半分佐领改编为整佐领的前提是兵丁足额。一般而言，兵丁足额通过三种途径实现。

第一是吸收半分佐领内的余丁编立为一整佐领。如，镶黄旗满洲第三参领第十二佐领原系国初以哈尔敏地方来归人丁编为半个牛录。至康熙二年，人丁足额，始编为整佐领。^[9]镶蓝旗满洲第一参领第一佐领，原系国初编立之半个牛录，康熙三年因人丁滋盛编为整佐领。^[9]镶黄旗蒙古右参领第四佐领原系喀喇沁地方蒙古。于天聪六年编为半个牛录。至康熙二年，人丁满额，遂编为整佐领。^[9]

第二是合并半分佐领之外的人丁编为一整佐领。镶蓝旗满洲第二参领第十七佐领，系国初以蒙古来归人丁编立，始为半个牛录，以和硕之子波思希管理。到康熙三十四年，增以本旗余丁编为整佐领。^{[8](P.284)}与仅吸收本佐领余丁相比，这个佐领的兵丁来源于“本旗”，其来源范围相对较广。

第三是两个半佐领合并而改编为一整佐领。如，镶黄旗满洲第一参领第十三佐领系康熙二十三年以觉罗佛伦所管半个佐领与内大臣觉罗他达所管半个佐领合为一整佐领，以一等侍卫觉罗长命管理。^{[6](P.25)}在上述三种情况中，吸收半分佐领内的余丁编立一整佐领是最为常见的。

“新满洲四十佐领”及包衣佐领拨入八旗亦是康熙朝旗分佐领增编的形式。康熙初年，屯长扎努喀布克托请率众内移，宁古塔将军巴海安辑于墨尔根，编四十佐领，号称新满洲。康熙帝曾将部分新满洲部落成员迁入盛京、北京，编入满洲八旗。在八旗满洲中，共有12个佐领为新满洲改编而成，其中，镶黄、正黄、正白三旗各有4个。^[10]镶黄旗满洲第一参领第十四佐领和第十五佐领、正白旗第四参领第十五佐领等都是康熙

朝由新满洲拨入八旗满洲的。

在整个清代，包衣佐领与旗分佐领分属两个独立的组织系统。旗分佐领统属于各旗都统，包衣佐领初隶领侍卫大臣，康熙十三年改归内务府。由于包衣是皇帝的奴仆和私属，他们一旦受宠执掌重权，有可能享受抬旗或改旗殊荣。在人数众多的内府旗人中，能够膺此殊荣的只是凤毛麟角。镶黄旗第五参领第十五佐领，原系康熙十九年奉旨将包衣下侍卫飘色与前锋统领索柱巴图鲁由包衣拔出，合各姓满洲编一佐领。该参领第十四佐领系康熙六十一年将包衣哈达合族人等由包衣拔出编一佐领，即着哈达管理。^{[6](P.49)}正黄旗满洲第三参领第十四佐领，是康熙六十一年将镶蓝旗包衣佐领内太后之亲族及阿萨纳佐领内太后之亲族合编成一佐领的。^{[4](P.73)}正白旗满洲第四参领第十六佐领，原系康熙二十二年由包衣昂邦图巴族人及三旗各包衣佐领下所有索伦编一佐领，拔隶本旗蒙古都统。康熙四十四年移入本都统。^[11]上述佐领均由包衣下属改编而成，进入旗分佐领标志着这些包衣旗人的社会身份与地位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三

康熙时期，佐领的增编与清朝政治、军事、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这项贯穿康熙朝始终的活动是在“满洲根本”的政治理念指导下展开的，佐领的增置，既有充实八旗兵源的军事意图，也有解决兵丁生计问题的现实需要。

清王朝是以满洲贵族为主体建立起来的，满洲人是国家所依恃的核心力量。这一性质决定了国家必然要最大限度地维护满洲人的种种利益。“满洲甲兵系国家根本，虽天下平定不可不加意爱养”^[12]的呼声真实地反映了康熙帝对八旗满洲的倚重与依赖。康熙五十六年，康熙帝曾盛赞满洲兵丁：“一心奉法，假如千人会于一处，死则同死，断无离心。”^[13]后人的总结与之如出一辙，满洲贵族深知“得朝鲜人十，不若得蒙古人一；得蒙古人十，不若得满洲部落人一”。^[14]

康熙时期，清朝统治者面临着进一步巩固政权的考验。因此，培植并掌握一支赖以信任的军事力量遂为康熙帝所格外关注。而此时，汉军已经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大量增设以满洲为主的八旗佐领就成为顺理成章之事。从根本上说，康

熙朝八旗佐领的设立是在不折不扣地践行“满洲根本”，它服从并服务于清朝统治者维护与扩大政治权利这一基本出发点。

清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八旗军队的建设。兵丁数量对于八旗发展与建制完善始终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太祖高皇帝辛丑年，满洲生齿日繁，诸国归服人众，设四旗以统之。……至甲申年，削平诸国，中外臣民归附者众，增设四旗”。^{[10](P. 4511)}显然，这里强调了大量归附者的加入推动了八旗制的确立。

入关初期，战事频繁。康熙十二年至二十年又发生了“三藩之乱”，康熙帝调动满洲、蒙古、汉军八旗和绿营汉兵数十万，全力以赴，与数十万叛军鏖战八年，最终平定叛乱。长期的战争，致使八旗兵丁伤亡严重，加之入关之初，“满洲人数本少”，^[15]在这种特殊形势下，迅速补充并增加兵源成为当务之急。康熙帝没有明确说明编设佐领的目的，但是，大规模的编设主要发生在三藩之乱前后，仅康熙二十三年就编立 177 个佐领，^①这些事实本身足以表明通过编设佐领来增强军事力量的明显意图。

毋庸置疑，佐领的编设源于扩充兵源以统一全国及平定各地反清斗争的迫切需要。与此同时，将大量八旗闲散余丁编入旗分佐领，以此来缓解业已出现的八旗生计问题亦是康熙朝大量增置佐领的重要推动力。

康熙初年，八旗兵丁“衣食不给”^[16]的生计问题令康熙帝深为忧虑。康熙十二年，针对满洲贫而负债者甚多的情形，康熙帝指出：“今见以佐领事讼者甚多，但知荣贵，而爱养所属之道，全然不知。或有佐领下各户之主不令披甲，听徇情面，令家人披甲者甚众，此等俱宜严行禁止，停其家人披甲。或二三佐领，或四五佐领，酌量归并，将闲散满洲令其披甲，则满洲人丁各得食粮，庶可少资生理。”^[17]显然，不能披甲造成闲散余丁的生计艰难。归并闲散增置佐领，能够为生计无着的贫困旗人创造披甲食粮的机会，通过扩大八旗的惠及面来解决兵丁的生计困难，这是康熙朝增置佐领的经济动因。

康熙时期，旗分佐领的编设是否遵循一定的原则？从实录、旗分志等记载的相关信息可以肯定，佐领的编设体现出如下两个突出特点：

第一，兵丁足额的特点。清朝一佐领所辖壮丁数在各个时期有所变化。一般认为，皇太极时每佐领壮丁约略 200 人；康熙时百三四十人；嘉庆时，则以 150 人为率。^[18]康熙朝一佐领辖壮丁 130—140 人，其主要根据是都统图海、尚书明珠等人的建议。康熙十二年，他们向皇帝提议，“满洲、蒙古都统下每一佐领，除留一百三十人以上、一百四十人以下外，其余丁另合为一佐领”。^[19]事实上，官方的规定与实际情况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由于每个佐领的人员构成、隶属关系都有所区别，因此，旗丁数额的差距也就比较悬殊。既然佐领的兵额数并非整齐划一，那么足额的原则只能依据佐领通常的人数底限来加以确定。

康熙时期，在佐领的编设中有“百丁之数”之说。康熙六年，理藩院题“查打虎儿有一千一百余口，未编佐领，应照例酌量编为十一佐领”。^[20]打虎儿与八旗满洲、蒙古、汉军的编制原则相同。打虎儿一千一百余口，应照例酌量编为十一佐领的提议正好符合百丁编一佐领的原则。其实，以百丁之数编一整佐领并非打虎儿所独有的现象。旗分志中以百丁编一佐领的记载屡屡出现。镶黄旗满洲第四参领第十七佐领，系八旗满洲中的俄罗斯佐领，它以半分佐领为基础，至康熙二十二年，来归的俄罗斯人达到百丁始而编立为一整佐领。^②镶黄旗第四参领第十一佐领，系康熙十三年分编八旗佐领时，将公主门上行走之顾尔布什额附半个佐领人丁并英亲王门上行走之察哈尔地方来归人丁，增以顾尔布什之孙禅保佐领内滋生余丁二十七名，共足百丁之数编为一佐领。^[21]正红旗满洲第三参领第一佐领系康熙二十三年，郎图族人七十六丁，合瑚什布佐领内十八丁共九十四丁即编为一佐领。^[22]镶白旗蒙古左参领第四佐领，原系第三佐领内丁壮。康熙二十三年，昂格参管佐领时，人丁滋盛六十名，

① 此数据根据《钦定八旗通志》旗分志所记统计。

② 《钦定八旗通志》卷三，旗分志三，第 44—45 页。刘小萌先生仔细考察了清代北京俄罗斯人编设佐领的情况，他认为，“康熙时期，八旗满洲佐领的标准丁额为 100 人”。见刘小萌：《关于清代北京的俄罗斯人——八旗满洲俄罗斯佐领历史寻踪》，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论丛 2007 年号·商鸿逵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专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6 年，第 367 页。这里的百丁之数理解为佐领编设的人数底限似更为恰当。

与多尔济佐领下人丁四十二名合编为一佐领。^[23]镶蓝旗蒙古第一参领第十三佐领,系康熙七年因贝子傅腊塔所属人丁满百,编为一整佐领。^[24]以上各佐领得以编立的关键在于它们都达到了“百丁之数”,因此,“百丁之数”就应该是康熙朝编设佐领所必需的丁额底线。

第二,向八旗满洲与上三旗倾斜的特点。康熙朝编设八旗满洲、蒙古、汉军佐领分别是356个、76个、55个,满洲佐领的增数遥遥在先。另外,顺治、康熙两朝汉军佐领与满洲佐领增数的变化也颇能说明问题。顺治时期,八旗满洲增加8个整佐领,汉军佐领的增数却是49个,汉军力量在这一时期的迅速发展在于清朝入关初期特殊的政治形势,“汉人有所顾忌而不敢尽忠于朝廷,满人又有所凭藉而无以取信于天下矣”。^[25]汉军旗人能够以其特殊的身份在满洲与汉人集团之间维持着某种利害上的平衡。但是,康熙帝在1680年代批评“汉军习尚之恶已至于极”,^[26]随着清廷对待汉军态度的公开转向,佐领的增置成为以满洲为核心的统治者扩大其政治、军事、经济权利的最有效而便捷的手段。

八旗内部存在着上三旗与下五旗分治的体制,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上三旗为“天子自将”,归皇帝自领,地位高贵,人多势众,是八旗的核心。这一时期,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增编旗分佐领各为71个、70个和63个,其中,镶黄、正黄两旗增加的佐领数在八旗之中是最多的。从增量上看,康熙朝上三旗共增加204个佐领,这一增数占整个上三旗佐领定数的44%,为康熙朝佐领增数的41.9%;下五旗增加283个佐领,为下五旗佐领定数的41.8%,占康熙朝佐领增数的58.1%。尽管下五旗佐领增加的绝对数略多,但平均到每一个旗分,上三旗佐领的增加率还是超过了下五旗。直到雍正时期,由于八旗汉军佐领多寡不等,以致发生了将上三旗汉军佐领划入下五旗,“酌量均匀”的事情。^{[10](P.4540)}

除上述两个突出特点外,康熙时期,佐领的设置还有根据形势变化而及时增置的应急性特点,按照八旗内部不同人群分别编设的同质化特点,八旗满洲中的俄罗斯佐领、新满洲佐领的兵丁均由来归的本部人员所组成,其同质化的程度

也因此较高。总之,随着佐领总数的增加,每佐领的标准丁额却有所缩减,八旗内部的各色人群亦被纳入身份区别更为严格的组织之中。

五

经过康熙朝大规模增编旗分佐领,历雍正、乾隆两朝,八旗满洲合计增加7个整佐领,八旗蒙古增加1个整佐领,汉军增加2个整佐领,至此,八旗的佐领建制就大体完成。显而易见,康熙朝增置佐领对于八旗建制的最终定型是至关重要的。到康熙六十年,满洲八旗男丁已增至十五万四千余丁,比顺治十四年增加了两倍多,蒙古八旗男丁六万一千余丁,也增加了两倍,包括汉军、包衣,八旗男丁总数为六十九万六千余丁,比顺治十四年将近增加一倍。^①充足的兵丁增强了清军的战斗力。圣祖时期,八旗的雄风犹存,在谈及八旗兵丁时,康熙帝的自豪溢于言表:“本朝满洲官兵从来精锐骁勇,遇寇必克,所向无敌。”^{[12](P.161)}事实上,在康熙朝安定西北、西南,拓土辟域,保卫领土的系列大战中,以满洲八旗为核心的清军保持着劲悍的斗志,他们勇猛冲杀,屡建功勋。

康熙时期,八旗军队肩负着“环拱寰极,绥靖疆域”的重任。他们战时奉命出征,平时以时操练,春秋两季还要进行长时间的集中训练,当差披甲成为他们唯一的职业。为此,清廷制定了优厚的旗兵兵饷。康熙中年定制:京师八旗前锋、亲军、护军,月给饷银四两,骁骑三两,皆每岁支米二十四石。这比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监丞、七品父母官知县的俸银禄米还略多一些。这份兵饷被后人称为旱涝保收的“铁杆庄稼”。而且,当上护军、亲兵、前锋、马甲还有机会往上升迁,遇有征战,立有战功,或者差使干得好,还有晋升的机会,这样既可提高社会地位,又可获取更多的俸银。但是,这种优养的待遇却同时剥夺了旗人的自由与创造力。

为了保持八旗队伍的稳定,康熙十八年,清朝在各旗设置都统、副都统,并规定都统的职责是掌满洲、蒙古、汉军八旗之政令,稽其户口,经其教养,序其官爵,简其军赋,以赞上理旗

^① 八旗兵丁的具体人数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这一档案所载数见安双成:《顺康雍三朝八旗丁额浅析》,《历史档案》1983年第2期,第100页。

务。随着八旗组织管理体制的正规与严格，八旗兵丁隶属于佐领，佐领长官职掌人口、田宅、婚丧、兵籍诸事宜，对本佐领人户拥有很大的权限，“凡位居公侯并俯就之，犹县令之辖乡绅也”。^[27]这样，旗人从摇篮到坟墓的整个生活过程完全受到八旗的辖制。

诚然，大量余丁被纳入佐领，这对于暂时缓解旗下闲散的生计困难不无裨益。然而，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是，随着清朝国威的日益远扬，被八旗制度紧紧囊括其中的兵丁却日益沦落至贫困。八旗兵丁作为国家的根本，康熙帝希望他们“生计充裕，匮乏无虞”，因而“大沛恩施”。增置佐领作为施恩于旗人的一种形式，从

长远来看，它对清朝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更为持久而深刻。清朝入关后，随着八旗组织的军事职能进一步强化，八旗兵丁迅速退出生产领域。他们不事农耕，又不能经营工商，如果外出谋生，将会因为“逃旗”而受到重惩。除了当兵食饷外，旗人只能仰给于统治者的赏赐。而且，康熙中期以后，清朝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又刺激着八旗兵丁在鲜衣美食、游玩娱乐等方面的奢侈性消费。在这种情况下，康熙帝追求国家根本稳固的愿望与旗人难以资生的社会现实之间的裂隙越来越难以调和，这一局面发展至乾隆时期，严重的八旗生计问题遂成为清朝社会难以应对的痼疾，盛世的辉煌也由此黯淡逝去。

〔参考文献〕

- 〔1〕金德纯. 旗军志 [A]. 金毓绂. 辽海丛书 [C]. 辽沈书社, 1992, 2603.
- 〔2〕孟森. 八旗制度考实 [A]. 明清史论著集刊 [C]. 北京: 中华书局, 1969; 陈佳华, 傅克东. 清代前期的佐领 [J]. 社会科学战线, 1982 (1); 清初满洲牛录的特征 [J]. 社会科学辑刊, 1982 (5); 佐领述略 [A]. 满族史研究集 [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滕绍箴. 努尔哈赤时期牛录考 [J]. 民族研究, 2001 (6); 赵凯. 清代旗鼓佐领考辨 [J]. 故宫博物院院刊, 1988 (1).
- 〔3〕李洵, 赵德贵等主点校. 钦定八旗通志 [Z]. 卷四, 旗分志四,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2, 60.
- 〔4〕钦定八旗通志 [Z]. 卷四, 旗分志四, 62.
- 〔5〕钦定八旗通志 [Z]. 卷十, 旗分志十, 177.
- 〔6〕钦定八旗通志 [Z]. 卷二, 旗分志二, 65.
- 〔7〕钦定八旗通志 [Z]. 卷六, 旗分志六, 108.
- 〔8〕钦定八旗通志 [Z]. 卷十六, 旗分志十六, 275.
- 〔9〕钦定八旗通志 [Z]. 卷十八, 旗分志十八, 313.
- 〔10〕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Z]. 卷八三七, 八旗都统,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 [Z]. 第 70 辑, 文海出版社, 1999, 4525.
- 〔11〕钦定八旗通志 [Z]. 卷七, 旗分志七, 119.
- 〔12〕钦定八旗通志 [Z]. 卷首八, 敕谕二, 155.
- 〔13〕康熙起居注 [Z].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十月,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2448.
- 〔14〕魏源. 圣武记 [Z]. 卷一, 开创,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9.
- 〔15〕清朝文献通考 [Z]. 卷五六, 选举十,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0, 5381.
- 〔16〕徐旭龄. 力行节俭疏 [Z]. 贺长龄, 魏源. 清经世文编 [C]. 卷五四, 礼政一,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1355.
- 〔17〕清实录·圣祖实录 [Z]. (第四册) 卷四十四, 康熙十二年十一月辛丑.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583.
- 〔18〕孙文良. 满族大辞典 [Z]. 佐领条,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0.
- 〔19〕清实录·圣祖实录 [Z]. (第四册) 卷四四, 康熙十二年十一月辛丑, 583.
- 〔20〕清实录·圣祖实录 [Z]. (第四册) 卷二二, 康熙六年闰六月癸酉, 310.
- 〔21〕钦定八旗通志 [Z]. 卷三, 旗分志三, 43.
- 〔22〕钦定八旗通志 [Z]. 卷八, 旗分志八, 142.
- 〔23〕钦定八旗通志 [Z]. 卷二十, 旗分志二十, 353.
- 〔24〕钦定八旗通志 [Z]. 卷二十一, 旗分志二十一, 383.

- [25] 储方庆. 殿试策 [Z]. 清经世文编 [Z]. 卷七, 治体一, 197.
- [26] 钦定八旗通志 [Z]. 康熙二十六年十月二十六日上谕, 卷首八, 敕谕二, 157.
- [27] 谈迁. 北游录 [Z]. 纪闻下,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375.

Introduction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Zuoling’ in Kangxi Period of Qing Dynasty

SUN Jing

(Institute of Northeast Ethnic Groups, Dalian College for Nationalities, Dalian 116600)

[Abstract] An important measure that Kangxi took to perfect the grass-root organizations of the eight banners was to establish ‘Zuoling’ in large scale. The establishment of ‘Zuoling’ was under the principle of ‘Marzhou Centered’. The increase of soldiers in the eight banners was of special significance for the stabilization of the governance of Qing Dynasty. However, the strengthening of bondage to the soldiers in the eight banners heavily corroded the livingness of those who were in the eight banners. The declining of prosperous and strong Qing Dynasty was then not evitable.

[Key words] Qing Dynasty; the eight banners system; Marzhou centered

〔责任编辑 李 劼〕